

“八·一三”期间上海的救亡报刊

吴景平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随着救亡运动的广泛深入的开展，涌现了大量的救亡报刊。这些救亡报刊的主办者有文化、新闻界的爱国人士，也有救亡团体。这些刊物成为上海救亡运动的重要的舆论阵地。

一、救亡报刊的概况

《呐喊》周刊，以茅盾为编辑，巴金为发行人。上海战争爆发后，原来的文学社、中流社、文季社、译文社等四家已无法继续从事正常的出版发行业务，因此合办了这份救亡文学周刊。《呐喊》于八月二十二日创刊，出版两期后，九月五日改名为《烽火》周刊，到十一月七日，共出版了十期。该刊以诗、短论、杂感、小说、速写、报告、信札、回忆录等文学形式，进行着“和民族独立自由的神圣战争紧紧地配合起来的文化工作”。^①主要撰稿人有巴金、茅盾、胡风、王统照、艾芜、刘白羽、靳以、萧乾等人。

多挺。中国军队也付出了重大伤亡，据郑洞国后来报告，单驻印军各师总计阵亡官兵2345人，负伤6690人，失踪112人，其他远征军尚不在内，损失亦不为不重。^②

中国军队在滇西和缅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全国许多报纸都发表了这一胜利喜讯，进行热烈的祝贺，一些报纸评论指出：这次缅战“真是一场恶斗，一首史诗，一桩惊天动地的英勇事业”。^③美国陆军部长称颂这次反攻是“东南亚的要闻”。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入缅之战，开创了大陆反攻的新阶段”，又说，这次反攻“从侧翼牵制太平洋战区，可巩固印度，完全打破轴心国会师远东之企图”。^④中共中央也从延安发出电讯，通过《新华日报》，热烈祝贺远征军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指出：这一胜利是由于全体将士协力一致、英勇效命所得到的成就。^⑤

中国远征军从失败到胜利的艰苦历程，反映了中国人民百折不回的抗战决心，它的胜利，重新打通了中国西南的国际运输线，使国际援华物资继续运入中国，对中国大陆战场的最后总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这也是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中配合盟军，打击日寇所作的重大贡献。对于国民党军官戴安澜、杜聿明、孙立人等爱国将领在这次战斗中所建立的功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① 《创刊献词》，《呐喊》创刊号，1937年8月22日。

② 梁敬尊《史迪威事件》，第199页。

③ 《扫荡报》，1945年1月6日。

④ 《纽约时报》，1944年5月16日。

⑤ 《新华日报》，1944年8月8日。

九月一日，由《世界知识》、《妇女生活》、《中华公论》、《国民周刊》四家刊物合办的《战时联合旬刊》创刊，编辑为金仲华、沈兹九、郑振铎、钱亦石、张仲实、张志让、王志华、王纪元、谢六逸、杜佐周。到十月一日出版了第四期，尔后各杂志又独立出版发行。《战时联合旬刊》其他撰稿人还有王任叔、潘汉年、叶秋、罗琼、王统照、罗叔章、史良、萨空了等人。

《文化战线》旬刊，九月一日创刊，由“上海编辑人协会”主办，施复亮、艾思奇、金则人、宋易、周木斋、姜君辰、陶亢德为编委会，钱俊瑞、孙冶方、钱亦石等都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到十一月上海沦陷，该刊共出版了八期。《战时妇女》旬刊，创刊于九月五日，胡兰畦、蒋逸霄、梁光、歌三、王汝琪、郁风为编委会。该刊实际上是上海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分会的机关刊物。由于《妇女生活》在八月一日出至五卷第二期后停刊，《战时妇女》成为当时上海妇女运动唯一的救亡刊物，对妇女救亡运动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到十一月，该刊共出版了十期。

《战线》五日刊，九月十三日创刊，编委会由章汉夫、夏征农、艾思奇、章乃器、王达夫、刘惠之、吴敏、陈楚云组成。主要撰稿人还有郭沫若、史良、许涤新、石西民、李公朴、恽逸群等。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八路军在晋北出击日本军队，获得重大战果，章汉夫曾在《战线》第四号上发表《国民统一及晋北屡捷》一文，指出国共合作与晋北大捷不是偶然的，是在“抗日第一的原则下，达到了国共的合作。而全国同胞这几年来奔走呼号的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实现。事实证明内战不应再继续，证明抗日红军（现改国民革命军）是个可宝贵的力量”。十一月七日，该刊出至第十一期。

《抗战半月刊》，九月十五日创刊，这是当时影响较大的文摘类刊物，其主旨是“选辑各杂志和日报晚刊的精华，以供众览，聊为救亡工作加添一点力量，使得救亡的理论和文艺普遍散播于群众之间”。^①该刊创刊号从《抗战》三日刊、《呐喊》、《救亡日报》、《国讯》、《七月》等二十来份报刊上选辑了四十位作者的作品，其中有巴金、茅盾、郭沫若、胡愈之、曹聚仁、黄炎培、王芸生、冯玉祥、艾芜、张天翼、傅东华、萧军、萧红、阿英、欧阳山、沈起文等人。十一月，该刊出至第三期。

《救亡周刊》，十月十日创刊，这是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的机关刊物，刊名系沈钧儒先生所题。沙千里先生在该刊发表过多篇文章，职协的其他领导人王文清、许德良、黄逸峰也多次撰文。该刊还刊载过职协的宣言、告职业界同人书等文件，对职业界后阶段的救亡活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该刊到十一月出至第五期。

《救亡漫画》五日刊，于九月二十日创刊，由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主办。“八·一三”的炮火使上海几家主要的漫画刊物停刊后，漫画家们一度不得不以“游击形式”作战，即义务地为各救亡刊物绘制抗战漫画，并组织漫画宣传队到民众中去。《救亡漫画》创刊后，以此为中心，大量地产生了许多有力的作品，其中有蔡若虹、叶浅予、鲁少飞、汪子美、华君武、丁聪、江栋良、张乐平等人。他们用画笔为武器，以有力俏皮的画幅，撕破了日本侵略者的兽行和假面。该刊以画为主，辅之以短诗和杂文。到“八·一三”后期，该刊还发表过赖少

① 《发刊词》，《抗战半月刊》，第一、二期合刊，1937年9月15日。

其、李桦等人的木刻作品。从第七号起，发行《救亡漫画》的南京、汉口、香港版。十一月十日上海沦陷前夕，该刊出至第十一号。上海美术界其他救亡画刊还有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战时画报》、新生周刊社出版的《抗日画报》、生活书店出版的《抗敌画报》等。

此外，《光明》杂志战时号外版、《非常情报》、《战时教育》、《战时大学》、《民族呼声》、《战时文摘》等刊物在救亡运动中的影响都较大。

在上海“八·一三”期间众多的报刊中，“七君子”之一、著名救亡运动领袖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以及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始终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的最前列，起的影响和作用也最大。

二、高举全面抗战旗帜的《抗战》三日刊

八月十三日，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上海，邹韬奋由南京赶回上海，经过几昼夜紧张地筹备，八月十九日，《抗战》三日刊在淞沪抗战的炮火中诞生了。《抗战》三日刊每逢三、六、九日出版，至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出版了二十九号。因受上海租界当局的干扰，自第七号起（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一度改名为《抵抗》三日刊。邹韬奋既是该刊的编辑人，又以“韬奋”、“韬”、“编者”、“记者”、“落霞”的署名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和答读者问。其他主要撰稿人有金仲华、潘汉年、胡愈之、钱俊瑞、杜重远、张仲实、张志让、章乃器等人。《抗战》三日刊在第一号中宣布：本刊的任务，要对直接间接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作有系统的分析和报道，是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期间的迫切要求。

《抗战》三日刊把动员广大民众投入救亡运动，作为进行全民抗战的重要问题。邹韬奋在该刊第一号发表的社评中指出：要保障军事胜利，必须对“政治准备太落后于军事的行动”的状况，“实有迅速补救的必要”。^①《抗战》三日刊登载了多篇文章来阐述动员民众的重要性，如潘汉年的《政治动员的基础》、《群众动员的基本问题》，李公朴的《全民动员告国人书》，王任叔的《军政与民众》等等。这些文章都强调指出：要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单有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是不行的，必须广泛地动员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才能弥补中国军事等方面的不足，才能击破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的战争迷梦。《抗战》三日刊十分注意发动各界的民众，刊载过艾思奇的《文化在抗战中》、胡绳的《战争时期的文化界》、张仲实的《知识分子当前的责任》、胡子婴的《怎样动员全国妇女》、章乃器的《怎样开展弄堂组织》等文章，对抗战的全民性及各界民众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作了充分的阐述。

《抗战》三日刊多次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政府限制民众运动的态度。沙千里在《民众组织的前提》一文中指出：虽然“组织民众”、“动员民众”的呼号已经响彻云霄，震耳欲聋，但是仍然存在着“民众运动的混乱，民众组织的散漫”，主要原因在于当局对民众救亡运动的种种“防止”、“统制”，^②从而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对待抗日民众运动的“叶公好龙”式的态度及其危害。邹韬奋在《防家贼与民众运动》中指出：“我们要注重的民众运动不可以挂了一块招牌为已足，必须开展真正的民众运动”，“我们都要把少数人的利益抛开，大家的心目中只有整个民族的利益，这样才能达到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目的”，^③因而在实质上剖析了片面抗战路线的阶级根源，是在全面抗战中固执国民党一家一己的私利。

《抗战》自创刊后，始终注意揭露抗战阵营中的民族失败主义，抨击在抗战爆发后时常抬

① 邹韬奋：《政治准备的补救》，《抗战》三日刊第一号，1937年8月19日。

② 《抵抗》三日刊，第七号，1937年9月9日。

③ 《抵抗》三日刊，第十七号，1937年10月13日。

头的妥协投降的逆流。“八·一三”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上海后，国民党营垒中的亲日投降派不时散布“战则必败”的妥协投降论调。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及淞沪战场的失利，这种逆流便甚嚣尘上。《抗战》三日刊与其他救亡报刊一起，组织了多篇文章，对散布妥协投降论调的民族投降主义发动了“围歼战”。《抗战》第一号发表了邹韬奋写的随笔《战的反而》，尖锐地指出：“‘和平’的本身，谁也不反对，但是丧权辱国甚至亡国灭种的‘和平’，却是我们所极端反对的”，“余下的唯一有希望的途径是整个民族的坚决抗战！”该刊接连发表了张天翼的《真假汉奸》、孙冶方的《从汉奸谈到乡村工作》、长江的《严重的汉奸问题》、梁士纯的《辟妥协心理》等文章，剖析了民族投降主义的种种表现。该刊还发表了胡愈之撰写的《谨防疫病》，指出：妥协是一种疫病，六年以来，已经散布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间，在经过一度的军事失败之后，便要乘机活跃。^①从而揭示了民族投降主义的历史根源。十月二十六日，上海的中国军队退出江湾和闸北，撤到第二道防线继续抵抗敌人。第二日，上海一时妥协投降的谣言四起。对此，十一月三日该刊发表了潘汉年的《加强我们的团结》一文，故意引用了蒋介石在庐山讲的“中途妥协，就是灭亡”和陈诚说过的“中途言和者……是亡国灭种的罪人”等一些话，还击国民党营垒中妥协投降的逆流。上海沦陷后出版的该刊第二十七号，还发表了胡愈之写的《寻求与国与团结民众》质疑》一文，指名对汪精卫散布的投降主义的论调予以痛斥。

《抗战》三日刊还对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加以充分的报道和赞扬。《抗战》多次载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是领导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中坚力量，多次报道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英雄作战、组织并武装民众进行敌后游击战的业绩。九月二十二日中央通讯社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后，九月二十六日该刊便刊载了宋庆龄的重要文章《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同时，邹韬奋在《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这篇时评中，指出中共的宣言所表示的宗旨是“团结御侮”、“共赴国难”，这个报道“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所一致拥护的”，而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全国一致团结，“宗保障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大的打击！”^②同一期还是道了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一部、获得重大胜利的战况。第十三号、第十六号旨的《抵抗》又指出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进入晋北开展游击战的胜利，尔后出版的该刊还报了八路军继续发动和武装民众，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的消息。

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立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热血青年，把中共中央所在的延安看作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希望，因此常有青年来信询问如何奔赴延安，并要该刊向中国共产党有关方面转达他们的要求。为了满足青年们的进步愿望，该刊在第二十号发表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关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来信，还刊登了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九月五日签发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第二十五号又刊登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关于陕北公学的来信，介绍了延安和陕北公学的情况和赴延安的具体办法。邹韬奋为此还专门写了时评，热情鼓励青年学生不怕艰苦、前往陕北求学的“强烈的情绪”。^③

《抗战》三月刊十分注重迅速地报道情况，评论战局的进展，使民众能及时明确抗战的实际情况，从而树立长期抗战、投身救亡运动的决心。《抗战》第一号第一篇社评，便是邹韬奋写的《上海抗战的重要意义》，指出“这抗战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事实上表现中国的确能够抵抗侵

① 《抵抗》三日刊，第十五号，1937年10月6日。

② 参见《抵抗》三日刊，第十二号，1937年6月26日。

③ 《抵抗》三日刊，第二十五号，1937年11月9日。

略”，“巩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民族解放的光明前途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抗战》每均有金仲华撰写的“战局一览”，以简要明了的文字概述和评论淞沪战场和华北战场各阶段的局势。

《抗战》三日刊虽然每期篇幅不长，但仍然注意把严肃的抗日救亡主题内容与通俗、活泼的形式相结合。每期刊载的评论、通讯，并没有什么长篇宏论，但是言简意赅，具有鲜明的战斗性。该刊还多次发表爱国将领冯玉祥的诗作，如《攻克敌旅司令部》、《吴淞口大战》、《八百好同胞》等；沈钧儒先生也在《抗战》上发表过《敌与友》、《十月十六日闻炮声不能成寐》等诗；女诗人关露也发表过《重建起自由的城堡》。此外，漫画家蔡若虹还多次为《抗战》作画，以犀利的画笔，刺向日本侵略者及抗日阵营中的妥协投降派。

上海失陷后，《抗战》刊载文章指出，中国在军事方面由于“是军队的单独的抗战，而不是全民抗战；是政府的单独抗战，而不是民族抗战”，基本上失败了；但是在民众已经唤起、各党派合作已建立的条件，在政治、军事、国际关系方面都有着使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因素。因此，中国并没失败，中国的抗战进入了新的阶段。^①同样，《抗战》三日刊在上海坚持出版到第二十九号（十一月二十三日）后，迁到汉口出版发行。一个月后，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汉口出版了第三十号，继续高举全面抗战的旗帜，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战。

三、“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历史见证——《救亡日报》

《救亡日报》创刊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郭沫若为社长，编委会由文化、新闻界知名人士巴金、王芸生、王任叔、阿英、汪馥泉、邵宗汉、金仲华、茅盾、长江、柯灵、胡仲持、胡愈之、陈子展、郭沫若、夏丐尊、夏衍、章乃器、张天翼、邹韬奋、傅东华、曾虚白、叶灵凤、鲁少飞、樊仲云、郑伯奇、郑振铎、钱亦石、谢六逸、萨空了、顾执中等组成。《救亡日报》除了九月一日至五日停刊外，到十一月二十二日共出版发行了八十五号。该报指出：要使“战争能够胜利，国家能从危亡中得到复兴，一方面固有赖于前方英雄之将士，但他方面亦需要后方民众能持以坚持，为其后盾，这是所谓全民抗战之义。”^②作为“八·一三”期间救亡刊物中唯一的日报，《救亡日报》在动员、宣传、组织群众投入救亡运动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救亡日报》坚持及时而详细地报道、评述战况，认为这是发动民众的前提之一。《救亡日报》创刊时，正值日本“上海派遣军”开始在吴淞、石洞口、川沙口大举登陆，中日军队展开了激战。该报从第一号到第八号（九月六日）每日都在第一版以大字标题醒目报道战况。该报的“战局一览”栏专门报道淞沪、华北和其他地区战局的进展。九月十三日发表了《淞沪抗战一月记》，使读者对“八·一三”以来的战况有总的认识，并发表了胡愈之撰写的社论《上海抗战的一个月》，指出：上海抗战的一个月“在全部中华民族抗战史中，这不过是一页而已”，但是，“读了这一页，已经使我们增添了千百倍勇气和不可动摇的自信”。日本军队在淞沪战争中投入了陆、海、空军，并有多种技术兵种配合作战，使用了飞机、坦克、装甲车、大炮及毒气弹等较先进的武器。为了适应战事的需要，《救亡日报》从创刊号起便设“国防常识”专栏（九月下旬改为“军事常识”），介绍防空、防毒常识和现代化战争中的常用战略战术，这些战时常识的介绍，对扫除民众当中的战争恐惧论、悲观论和盲目乐观论，起了较大的作用。

《救亡日报》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倒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之际，九月二十五日，《救亡日报》在“救亡文件”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次日在第三版发表了蒋介石对中共宣言的谈话，并在第一版头条发表了宋庆龄《关于国共统一运动的感言》。九月二十七日，发表了何

① 参见钱俊瑞：《抗战进入新阶段》，《抗战》三日刊第二十七号，1937年11月16日。

② 《发刊词》，《救亡日报》1937年8月24日。

香凝给廖志(承当时在延安)的电文:国共团结抗战,对于汝父十三年改组国民党,执行三大政策之主张实现,为之安慰,汝须努力奋斗御敌,勉为政府抗敌后援,以竟汝父遗志。”同日发表了共产党员王任叔的文章《读中国共产党宣言志感》,指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一件事”,并提出,要进行抗日救亡必须坚持贯彻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救亡日报》经常报道八路军作战和延安的情况。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伏击日军后,全国士气为之大振,但是上海各报报道不详。九月三十日《救亡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特讯《第八路军平型关大捷记详》,较详细地报道了战况,指出“北方战局为之一变”,还刊载了朱德的相片以及他在七月十四日写的誓言:“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国家是我天职!”此外,还发表过通讯《今日的朱彭》、柳湜写的特稿《从太原归来——山西的新作风》、李公朴的《怎样挽回华北危局》。上海沦陷后,《救亡日报》仍然刊登了彭德怀的文章《战略与战术》、《论游击战争》、通讯《延安的公审法庭》、《陕北生活一断片》、《八路军在晋武装民兵》、《青年人向往的陕北公学》等。这些报道和文章,使广大民众看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是全心全意为拯救民族的危亡而战斗的,增强了人们与日本侵略者继续战斗的决心与信心。

《救亡日报》注重向读者介绍围绕中国抗战的外交动态和国际形势,每日第一版有“世界一日”栏,第三版有“时事分析”专栏,经常刊登颇有见地的评论。

《救亡日报》反映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两党求同存异、共同奋斗的情况。一方面如前所述,该报大量报道和高度评价了共产党及八路军为挽救民族危亡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战绩,另一方面也及时报道了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和淞沪战场的抗战,多次刊载蒋介石的抗战言论以及其他国民党将领在这一时期的抗战事迹和演说,如张治中、宋希濂、张发奎、陈诚、孙元良、罗卓英等。谢晋元、姚子青、郝梦龄等人的英雄业绩,也有多次生动的报道。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郭沫若等著名进步人士的抗战言论也得到充分的反映。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潘汉年为代表的不少共产党员常在《救亡日报》上发表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及行动纲领,以潘公展为代表的国民党上海当局也在该报多次发表抗日言论。因此,《救亡日报》也可说是国共两党曾经“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历史见证。

《救亡日报》不仅经常报道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活动并宣传其救亡主张,而且广泛地反映了整个上海地区救亡运动的情况。该报每日在“救亡短讯”、“救运速写”栏里报道各团体和广大市民的救亡活动,在“救亡文件”栏里时常发表各团体的救亡主张。九月十四日,该报还刊登了中华台湾革命大同盟总部的《告台湾同胞书》,表明了祖国危亡的时刻,台湾同胞与祖国人民共同抗敌的坚强决心。因此,可以说《救亡日报》是上海“八·一三”救亡运动的历史记载。

随着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各救亡报刊在租界出版发行日益困难。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失陷,日军司令官松井宣称如果需要,日军将在华界乃至公共租界采取“自由处置”。尔后,日军代表和日本驻沪总领事向公共租界、法租界提出,必须取缔租界内之“反日机关及言行”。这样,在租界当局的“劝说”下,上海各救亡报刊不得不停止出版。

“八·一三”期间上海的救亡报刊虽然只存在三个月,但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人民具有抵御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精神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和行动纲领,是领导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政治保证。重新打开这些报刊,仍可感到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广大人民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是以后抗日战争能在艰苦的环境下得以坚持、并且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条件。